

中国社会发展与
文化研究的探索

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 研究的探索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书 名：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

责 任 者：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标准书号：ISBN 7-301-02540-8/C·7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90千字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8.50元

前 言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原名社会学研究所，于1985年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建立。为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与各地区建立广泛联系，1988年同时设立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为进一步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发挥特色，研究所于199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研究所和“中心”始终遵循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宗旨，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研究与教学结合、科研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结合的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学科建设培养人才。既要重视对本学科理论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也要面向实际、着重研究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自建年以来，我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乡社会发展、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人口、环境、家庭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工作的另一个任务，是结合科研工作，逐步培养一批既能从事科研又能参与实际工作、既熟悉自己国情又了解国外情况、既能同国内各地学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保持联系又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高级科研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骨干的研究队伍。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指导下，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努力走立足本国，深入社会实际，从实地调查研究入手的路子。在研究中，他们努力把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国内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等

方面的发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比较分析，同时注意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研究所与“中心”建所以来承担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的综合研究（国家“七五”）；我国城乡社会发展趋势的研究（文科博士点课题）；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和运行机制（国外资助）；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教委“八五”）；中国社会流行现象研究（北京市社科青年基金）。

二、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国家“七五”）；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历史发展（国家“八五”）；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教委年轻教师基金）；苗族地区民族教育研究（国家社科）；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脱贫研究（国家社科）；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教委“八五”）；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协作课题）；呼伦贝尔农牧社区研究（协作课题）；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文科博士点）；我国蒙古族区域文化圈的划分与蒙汉文化交流（博士后基金）。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内蒙古牧区社会发展与牧民生育模式变迁（国外资助）；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研究（国外资助）；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研究（国外资助）。

四、蒙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中蒙关系（高校社科基金）；美国的种族、民族关系与外来移民（高校社科基金）等。

围绕以上课题的开展，我所的研究人员陆续完成许多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和研究专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研究所和“中心”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将积极开拓并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并在科研与教学的发展过程中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为加强与其它学术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交流，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迅速成长创造条件，特编辑一套论文集，定

名为《社会与发展研究论文集》，不定期出版。第一集《中国社会
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由高丙中、付喜国两同志负责编辑，得
到了全所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衷心地期望它能逐步拥有越来越
多的读者，并成为大家进行交流的学术园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 潘乃谷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前 言	潘乃谷 (1)
<hr/>	
社会学重建的回顾	费孝通 (1)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费孝通 (4)
费孝通的社会观初探	丁元竹 (20)
<hr/>	
我国小城镇的结构特征与进镇人口	
迁移	马 戎著 李建东译 (36)
家族组织与农村社会	
——甘肃省康乐县那尼头村调查	刘援朝 (70)
国有企业中的集体企业	
——甘肃省 16 家企业的调查	邱泽奇 (91)
从合作医疗到健康保险	
——四川省眉山县农村三级医疗	
卫生网典型调查	付喜国 张弘平 (113)
<hr/>	
汉民族的桥俗文化	周 星 (142)
论萨满教的巫仪	
——民间宗教的社会人类学阐释	色 音 (172)
论民俗生活的建构	高丙中 (197)
<hr/>	
评《身在黄金屋：在西藏的日子》	

..... 马 戎著 邱泽奇译 (223)	
“行行重行行”一解..... 邱泽奇 (225)	
<hr/>	
编后记 高丙中 付喜国 (229)	

社会学重建的回顾

费孝通

自从1979年重建社会学到现在已有近14个年头了，1982年我发表过“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已有10年多了，1985年又发表了“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也有7年多了。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再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去年高校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发表过一些意见，在此重复和补充一点。

13年前我们提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方针应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遵循着理论与实际工作者结合的原则进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原则是正确的，成绩也是主要的，社会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预示着社会的变革进程在加速进行，不断有新的台阶要跨越，新的情况要认识，新的问题要解决，社会学的研究园地必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高校的社会学系、所还肩负着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任务，任重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我还是想强调我们必须紧紧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密切联系实际，不断开展新的研究课题。对于高校社会学系，这也是

搞好课程建设和真正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为此，科学的社会调查必须做好，既要深入现场观察，还要着重系统分析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个发展过程，何况社会学中断时间很长，重建以来还很年轻，面对当前情况复杂，变化激烈的世界，我们社会学工作者要能从各自的基础和条件出发，在一定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进行冷静观察，如实的纪录，科学的分析，深入的理解。我主张首先做好专题调查，微观研究，把基础打扎实，不要一下子把题目搞的过大，急于搞综合的研究。如果第一步做得扎实，第二步综合性的研究就会做得好，才有可能避免泛泛的空论。

同时，我们从事社会学工作的人，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在这社会大变革中，各种现象太丰富了，有许许多多问题可以研究，我们要放手让大家去实践，我强调讲求质量和深度，但不主张讲求规格，求全责备，只要大家努力去做，在一定时间以后，五年或十年总会有比较成熟的收获的。

就我个人学术牵头的研究工作，经过这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可以提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以微型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即从村—镇—县—区域—全国，从小到大，进入全局研究。另一个方向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

知识需要积累，研究必须循序渐进，大家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希望大家同心协力，认真总结经验，肯定成绩，为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

形势逼人，培养新一代社会学工作者，一直是我们建设这门学科的首要任务。可喜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已有了一支年轻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任务还是十分紧迫。我自己的一代日益减少和衰老，我自己本人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虽则仍继续

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坚持不断地到各地去访问、观察和学习，但实际上只能做些为后人搭桥开路的工作，在学术上已难望有突破性的成就了。我深深感谢过去多年来同志们给我的鼓励和督促，希望一如既往鞭策我继续前进，老马未必识途，何况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新的胆略，新的智慧，深望后继有人，创出个新的天地。

一代学人诞生于一代学风，培养一代学风，人人有责，愿与社会学界同志们共勉之。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费孝通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迅速推向全国，促使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现在，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全国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被认为是“达到小康水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全国农民绝大多数已经脱贫，走向较高的生活水平。

近10年多来乡镇企业一直是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且有一个很长的背景，可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我最早到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是在1936年。那是我从广西大瑶山调查受伤回家乡养病时，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开始的。我所以选择开弦弓村，是接受家姐费达生的建议，她在这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那是我国农民自己办的最早的乡镇企业之一。它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那时我住在合作社的工厂里，看到农民在机器上缫丝，就想到这不是现代工业进入了农村么？我心里十分激动。我在该村调查了一个多月，便起程赴英国留学，在去伦敦的船上，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个学名叫“江村”。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根据这项调查

* 本文是作者1992年9月2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的演讲。

材料撰写了论文《江村经济》。在这期间，我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正在研究文化的变迁问题，他十分重视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我在他的指导下以“江村”为具体实例，描述了现代文化进入传统农村文化的过程。他在这篇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中说：对社会的改革“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指导的作用。”他认为我的论文中有关蚕丝业的那章是最成功的一章，“它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他对我在这些方面的鼓励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类学的发展到30年代，已碰到了研究文化变迁、文化接触的现象和现代文化的传播问题。在留英之前，我已经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生，在吴文藻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探索用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如杨庆堃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维舜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林跃华的《福建的一个家族村》，廖太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的《山西土地制度》，郑安仑的《福建和海外地区移民的关系问题》等等。所以马林诺斯基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用现在的语言来说，马氏所支持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而没有动摇过。

当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民在现代文化传播接触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我在《江村经济》的结论里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而穷困的根源一是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其出路是改革土地制度。其次是人口的不断增长。要在土地有限的农村里维持这么多人口，一方面必须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另一面要充分利用农村里的劳动力从事各式各样的生产活动。可是当时的环境，一方面受到传统土地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有外来势力和西方新技术的竞争，中国农民陷入极其贫困的境地。这种历史的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扎下根子。

由于在实地观察江村时，看到了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认为这是个在发展农村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这就是当时我对乡镇企业最初的接触和理解。简单地说，我从开弦弓村实地调查中，明确的感觉到农村需要现代工业。可是，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合作工厂的建立和存在有其特殊的条件，就是它有家姐费达生所在女子蚕业学校技术推广部的支持，引进了科学技术和工厂管理，并帮助培养人才和组织生产。这是当时一般农村不可能都具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注意到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在商品生产上国外有强大的竞争者。这些实验固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这个小小的实验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农村面貌。

1938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怀着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的愿望，暑假即急忙回国。但是我的家乡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江村的小型丝厂已经夷为平地。我只能进入抗战后方的昆明。在昆明云南大学，在吴文藻先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继续进行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调查。内地农村调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介绍云南农村调查

的《*Earthbound China*》一书中，再一次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现在回头来看，我的这项改变农民穷困的见解，尽管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结论，但从整个局面来说，其实还是书生论政，纸上空谈。这也使得我抛弃了不问政治的态度，而投身于当时的民主运动。从此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广义的政治分不开了。我当时提倡的“实用社会学或人类学”，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

到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使农业得以顺利发展，并且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但是那时没有发展农村小型工业的政策。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在“以粮为纲”的口号指导下，农村主要是去搞粮食来支持城市发展大工业。

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忧心忡忡。农民自己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手中无钱，市镇上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也萎缩了。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农村里应当提倡恢复副业和发展小型工业。我在《重访江村》一文中这样说：“农业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呢？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以前好过呢？问题出在没有发展副业上。”同时，我重新提出了“乡土工业”问题，讲到村子里办小工厂的好处。但是这种主张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不但没有被接受，在“反右”时还受到了批判。

直到70年代，这种限制农村单纯搞粮食生产的政策受到了事实的挑战。这项严重的挑战来自人口的不断加速增长。单纯依靠种植粮食的低收入，使广大农民在那不断增长的人口面前无法维持他们已有的生活水平。解放时我国人口5.4亿，经过32年到1980年已接近10亿，增加了81%，每年平均增长19%；1978年全国粮食比1949年固然增长了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了52%，经过解放以来30多年，到1980年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

额仅有 580 斤。以这样一个仅够糊口的粮食生产来维持农民全部的生活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各地区的产量不平衡，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所得低于平均数，因而贫困重又成了农村的主要问题。这种严重的处境曾在 60 年代初发生了全国性的“困难时期”，饿死的农民上千上万，接着是“文革”时期，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 20 多年中，由于我的言论和当时的政策相抵触，我被划为“右派”，失去了继续实地研究工作的条件。

80 年代初，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恢复了，社会学也恢复了，于是又重新开始我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1 年我三访江村。那时江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 300 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 倍。而 3 年前，即 1978 年江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还只有 114 元，为什么在短短的 3 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快地富裕起来？我看到家庭副业恢复了，集体小工厂办起来了。从农村经济新结构中农、副、工三方面来看，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

使我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三访江村”是我在英国的老师 R. Firth 为我去伦敦接受赫胥黎奖章作演讲出的题目，他建议我讲讲江村在半个世纪里的变化。这次演讲也决定了我其后 10 年的研究课题：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1982 年以后，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首先是从农村到集镇，提高了一个层次。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

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①。我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包括七大镇、十几个小镇的吴江县。我把单枪匹马的个人研究改变为组织队伍的集体研究，打下了以后建设研究中心的基础。

80年代初期已是中国各地小城镇复兴的时刻，我注意到家乡吴江县各个集镇上的人口无不在迅速增加。追溯过去，它们都曾在50年代进入过一个衰落时期，人口下降，70年代后期陷入谷底，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嗣后前前后后出现了生机，当我们1981年去调查时，这些集镇的面貌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这些集镇怎么会兴旺起来的呢？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注意到当时正在如异军突起地发展着的乡镇企业。因为这些是公社和生产队所办的工业，所以一般都称作“社队工业”。集镇是社办工厂集中的地方。这时集镇上新办的工厂纷纷到农村里去吸引农民出来当工人，集镇的人口也就多起来了。工业带来了繁荣，集镇上新的建筑一座座盖了起来，面貌大变。农村里也由于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办了工厂，收入增加了，农民生活改善了。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人口问题。7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提出了人口控制的号召，但已出生的人口已相当多。由于严格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用行政手段划清城乡户口，农村户口不能向城里迁移，于是农村中“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户口的隔离迫使农民另找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人口不向城市集中而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

^① 详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文作者观点和意见也参见此书。